

| 台湾研究系列 |

#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前瞻

## 台港澳研究系列之三

严安林 邵育群 主 编



| 台湾研究系列 |

#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前瞻

台港澳研究系列之三

严安林 邵育群 主 编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前瞻 / 严安林, 邵育群主编. --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7. 9

(台港澳研究系列; 3)

ISBN 978 - 7 - 5108 - 3009 - 9

I. ①两… II. ①严… ②邵… III. ①台湾问题 - 研究 IV. ①D6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28665 号

##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前瞻

### ——台港澳研究系列之三

---

作    者	严安林 邵育群 主编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3/5/6
网    址	www. jiuzhoupress. com
电子信箱	jiuzhou@ jiuzhoupress. com
印    刷	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毫米 × 1020 毫米 16 开
印    张	20
字    数	338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08 - 3009 - 9
定    价	58.00 元

---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 目 录

## 第一编 两岸关系演进

### 中国共产党对台方略的经济路径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 ······	严安林 童立群	(3)
“习马会”：背景与成因、亮点及其意义 ······	严安林	(19)
两岸安全管理：必要性、范围与模式构建 ······	童立群	(27)
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省思与建议 ······	严安林	(38)
台湾人对大陆负面态度的非理性因素探索 ——基于社会心理学的研究 ······	俞新天	(46)
两岸东海合作：推进领域与路径研究 ······	严安林 季伊昕	(59)
2012 年以来民进党两岸政策的变化及其制约因素 ······	严安林	(69)
蔡英文上台后的两岸关系走向 ······	严安林	(81)

## 第二编 台湾政局变动

2008 年以来民进党发展面临的困境及其根源 ······	严安林	(91)
民进党与台湾社会运动的关系 ······	季伊昕	(102)
“马王之争”：法律与政治制度根源探析 ······	严安林 童立群	(116)
台湾“太阳花”运动：性质、根源及其影响探析 ······	严安林	(127)
试论民进党再次上台后台湾“两大多元”政党格局的 内涵与特点 ······	童立群 严安林	(138)

## 第三编 亚太局势演变

台美日安全合作新趋势 ······	严安林 张 建 王晓虎	(153)
-------------------	-------------	-------

##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及对两岸关系

- 和平发展影响 ..... 邵育群 严安林 (166)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台湾的观点与角度 ..... 童立群 (178)  
试论奥巴马第二任期以来亚太安全政策的调整 ..... 张 建 (188)  
试论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对台军售问题 ..... 张 建 (202)

## 第四编 台湾对外关系新动向

马英九任内“‘务实’参与国际组织”策略:

- 观察与评估 ..... 童立群 (215)  
从国际因素看台湾反服贸风波 ..... 季伊昕 (225)  
台湾地区谋求加入 TPP 的基本意图及其面临问题 ..... 严安林 (240)  
台湾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的角色 ..... 严安林 张 建 (252)

## 第五编 香港问题新特征

- 香港在区域经济中的优势、挑战及前景 ..... 张哲馨 季伊昕 (267)  
香港青年问题:政治挑战、影响因素与可行选择 ..... 张 建 (278)  
浅析两岸关系下港台关系的“双向”发展及其前景 ..... 郑英琴 (289)  
美国国会对香港事务的介入及其对中美关系  
的影响 ..... 张哲馨 张 建 (299)

## 第一编

### 两岸关系演进



# 中国共产党对台方略的经济路径研究

## ——基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

严安林 童立群\*

两岸关系进入和平发展阶段以来，学界对两岸能否通过深化经贸联系达到“由经入政”、实现最终统一的目标一直存在争论，甚至对大陆“对台让利”等政策的取向也产生质疑。在这些争论背后，实际反映出了各方对大陆对台政策看法的不统一。究竟什么是“先经后政”“由经入政”？对此概念的理解十分重要，因为这是理解大陆整体对台经济方略的重要前提。在笔者看来，“由经入政”的政策要点在于两岸关系由经济的路径开端，带动两岸共同发展和社会整合，最终实现政治统一。它包括顺序不可颠倒的两个内容：第一是通过政治行动（主要是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促使两岸经济关系进入相互依赖的阶段；第二是两岸经济关系经过融合，带来政治上的顶层设计，确保两岸经贸关系正常化运行，使得“由经入政”成为两岸经济互动继续向前发展的内在需求，最终形成和平统一的经济路径。

作为执政党，中共通过“三大任务”把解决国家统一问题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联结在一起，突出了经济关系作为通向国家统一路径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即中国的统一过程，将所有中国人共同推动中华民族走向繁荣、民主、文明、现代化的一次伟大征程。马克思从宏大理论的视角探讨经济关系发生及发展的基本路径。马克思理论认为，产业分工的增强、经济交往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是一国各地区相互发展乃至融合、统一的最基本原因。近年来，基于对两岸经济一体化必然趋势的正确判断和两岸政治对话陷入僵局的基本事实，海内外学界出现了悲观与乐观两种极端的看法。悲观者

\* 严安林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两岸关系协创中心教授、上海市台湾研究会会长；童立群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台港澳所副研究员。

对“由经入政”“先经后政”等提出质疑，甚至得出了两岸“只经不政”的看法，开始怀疑“先经后政”政策的正确性。乐观者则得出“只要发展两岸经济关系，两岸政治问题就一定能够迎刃而解，政治对话与协商就一定会自然而然地实现，两岸就一定能够实现完全统一”等过于简单的结论，过分夸大了经济互动所能产生的政治效能。本文拟对如何观察和解释大陆对台经济政策提供一个合理的视角与方法，论证经济路径实现的可行性，并试图对上述两种观点予以矫正和回答。

## 一、经济路径与国家统一的互动机理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评序言》中明确表达了“经济活动在人类生活中的首要地位”这一思想。他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他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sup>①</sup> 这段话表明：生产方式，特别是经济基础决定着包含全部政治生活，也支配着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

正因为此，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强调，一切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当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中，从有关时代的经济发展中去寻找。“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sup>②</sup> 这里揭示了两个基本原理：其一，从宏观的历史抽象来看，就社会历史发展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页。

根本、终极的动因而言，经济决定政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反作用于经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状况对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具有决定性影响。其二，从特定的历史时段来看，政治与经济在现实生活中的关系是极其复杂的，不仅交互作用，在一定条件下政治能够对经济产生决定性的反作用，而且政治作为一个独立系统有其自身的运动规律。

如果将“统一”视为国家矛盾运动的一种政治现象，分析其与经济基础的互动关系。马克思认为，“就是要从‘经济发展’上去理解由此引起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现象的本质及其规律。政治经济学不是把财产关系的总和从它们的法律表现上即作为意志关系包括起来，而是从它们的现实形态即作为生产关系包括起来。”<sup>①</sup> 统一，根本上反映了一国内部政治结构的变化和变革，这种变革是建立在社会经济发展、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与政治关系的论述来理解，国家实现统一的关键，最根本在于由生产力的发展推动国家向统一的形态转化。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发展可被视为实现国家统一的重要路径。

### （一）经济发展的决定作用

从宏观的历史抽象来看，经济决定政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并反作用于经济，从而必须坚持经济发展的决定意义和地位，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在这些现实关系中，经济关系不管受到其他关系——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多大影响，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穿于始终、唯一有助于理解的红线”。<sup>②</sup>

在近代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形成由经济统一走向政治统一的道路具有典型性。以德国建立资产阶级民族国家为例，实现政治统一之前，德意志在19世纪30年代就已基本完成了经济统一，各邦独立的、充分的经济发展构成了经济统一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恩格斯分析道：“对于一个统一的‘祖国’的需求，是有一种强烈的物质背景的。……从讲求实际的商人和工业家的直接的业务需要中冒出的渴望，他们渴望能扫除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阻碍商业自由发展的全部小邦废物，他们渴望消除一切不必要的摩擦，因为要是德国商人想插足世界市场，就先要在家里消除这种摩擦……德国的统一已经成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5页。

<sup>②</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3页。

了经济上的必要。”<sup>①</sup> 马克思也认为，“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国家了。”<sup>②</sup> 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德国客观上实现了经济统一，从而为政治统一奠定了物质基础，导致政治统一——德意志共和国的最终建立。

## (二) 国家统一进程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

在特定历史时段、在一定条件下，“政治”（可理解为国家统一的进程）能够对经济产生反作用。作为一个独立系统，“国家统一”有其自身的运动规律。经济发展仅仅只在归结到底的意义上对统一起决定作用，并不是直接地、完全地、自发地作用于实现统一的各因素，而要通过一系列中间环节才能体现她的决定作用。恩格斯认为：“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确立的并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的……反作用。”<sup>③</sup> 恩格斯同时列举了政治反作用于经济可能出现的三种情况：一是政治有可能与经济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统一的进程会较为顺利；二是政治沿着与经济相反的方向起作用；三是政治阻止经济发展沿着既定方向走，而给它规定了另外的方向。后两种情况都会对国家和社会发展造成伤害和阻碍，同样也是国家统一道路上的绊脚石。历史上，1865年美国爆发内战，最根本原因在于南方落后的经济制度，日益不能适应工业革命后北方的大工业生产方式，这一经济矛盾无法调和，最终导致南北冲突爆发。美国南北战争最终以北方的胜利告终，这场战争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它维护了国家统一，废除了奴隶制度，进一步扫除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为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起飞铺平了道路。应该说，美国内战是通过某种方式（战争和武力的方式），将国家统一这一“政治”的方向扭转到与经济发展和经济关系同一方向，顺应历史发展的典型。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6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0—701页。

### (三) 国家统一各因素之间相互作用

恩格斯指出：“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sup>①</sup> 他还指出：“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sup>②</sup> 恩格斯甚至还认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某些社会因素有可能居于支配地位，强烈地制约其他社会因素的性质和发展，如中世纪的神学。列宁也说过：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sup>③</sup> 指的是某些特殊情况下其他因素的特殊意义。

以二战后两德统一为例。两德统一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层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德国从1949年正式分裂为东、西两个德国，即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1990年两德重新统一，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首先必须看到经济因素仍然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包括西德物质水平的积累，建立起足以负载统一的强大经济实力，也包括各国际“利益攸关方”，如苏联、美国、英国、法国等对各自从德国统一中获取经济利益的评估和判断。统一前夕，东西德国经贸往来一直保持着“内部关系”的特殊状态。1988年，双边贸易额高达144.71亿西马克。<sup>④</sup> 足见经济因素为统一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两德统一不仅仅经济发展了发挥作用的结果，还包含了有利的国际大环境、双方民族感情、两德的外交政策等内外条件的充分作用。首先，20世纪60年代后，联邦德国通过“新东方政策”开启了与民主德国实质关系的推进，民族感情因此得到了强化。双方在官方援助、旅游过境、交通邮电、卫生体育、家庭团聚等领域达成了相关协议，社会交往的深化使得“德意志美德”重新成为双方的共同追求。其次，美苏关系缓和、东欧剧变等国际形势，则对两德统一起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总而言之，两德的统一运动在多种因素作用下呈现分阶段、波浪式推进的过程，最后，两德统一也不是“临门一脚”式的快速统一，统一仍然经历三个发展阶段，包括签署“第一个国家条约”的经济统一、“第二个国家条约”的政治统一以及两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5页。

<sup>②</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2页。

<sup>③</sup> 《列宁全集》（第4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78页。

<sup>④</sup> 晏小宝主编：《德国的统一》，上海：远东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

德与美苏英法外交签署《最后解决德国问题的条约》三阶段，在不同阶段，各种因素所起的作用不尽相同。

## 二、中国共产党对台方略的经济路径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者，中共对台的经济工作是从推进祖国统一的战略高度来认识。中共对台政策是在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与政治关系的原理基础上，运用这一原理来指导总体的对台战略。在两岸迈向统一的过程中，一方面，经济是政治的基础；另一方面，政治又不是简单地被经济所决定，它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政治上层建筑经常并不紧跟经济基础的变革而变革，它往往会落后于经济基础并与经济基础的发展要求相矛盾。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与政治关系原理的基本观点。

### （一）培育统一完善的两岸市场体系

经济关系是民族国家各部分的一条最基本纽带。在一个统一国家的内部，各地区经济联系是紧密的而非割裂的。列宁指出：“国内市场是在商品经济出现的时候出现的；国内市场是由这种商品经济的发展建立的，而社会分工的精细程度决定了它的发展水平”。<sup>①</sup> 可以这样理解马克思主义观点，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角色是国家统一天生的“促进派”，商品经济越发展，统一的内在驱动力就越强。当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后，由于建立在平等自愿基础上的经济联系空前紧密，就从根本上铲除了导致国家分裂的经济根源，从而铸成国家统一牢不可破的经济基石。

马克思恩格斯曾设想，由建立“关税同盟”开始构建一国内部经济联系。他们认为，德意志统一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废除德国各小邦之间的无数关税壁垒和它们的形形色色的财政立法以建立国内市场，换句话说，就是成立德意志关税同盟”。<sup>②</sup> 首先从贸易开始，接着是削减、取消关税，实现货币自由互换等措施，由此建立统一的贸易经济区，实现“关税同盟”。在这个同盟内部，各邦间的贸易一切关税被取消，实现币制和度量衡制度统一，对外实行统一的关税制度和税率。一些小邦的命运也由此而定：要么加

① 《列宁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2页。

入这个联盟，在经济和政治上融为一体；要么永远离开德意志，自谋生路。因而，正是“关税同盟”将德国各邦的经济利益紧紧捆绑在一起，为将来政治统一埋下了伏笔。

再来看中国统一中的“市场同盟”。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时代不同，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世界经济发展中，按自由化程度的高低程度，区域一体化分为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和经济同盟等多种形式。两岸经济关系是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形成的特殊经贸关系，依据WTO的规范，两岸之间的经贸交往属于一个主权国家下两个关税区之间的经济关系，在性质上被视为“国内贸易”，但彼此之间的经济互动则必须遵循WTO规范。两岸经贸的“市场同盟”正是在这一定位和性质下逐步形成的。

2010年6月29日，海协会和海基会签署了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ECFA）。ECFA的主要特点包括：1. 内容主要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贸易便利化三方面，性质上是“类似自由贸易区（FTA）”的一种机制。2. 不拘泥于一般自由贸易区的开放度，其涉及的领域、开放的范围和速度均超过一般的自由贸易区；最重要的一点，双方后续通过不断扩大相互间的开放，增加和充实协议的内容。3. ECFA属于国家内部层面的经济合作行为。由于大陆和台湾均属于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因此彼此之间的经贸安排又具有区域内双边合作性质，必须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即两岸经贸关系既是世界贸易组织平等成员方之间的经贸关系，又是一个国家主权结构下相互依存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经贸关系。

ECFA的签订是两岸关系进入和平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在萧万长提出的“两岸共同市场”理论<sup>①</sup>中，两岸共同市场就是大中华市场，其最终目标是成为整合大陆、台、港、澳的经济体，进而为形成中华民族统一市场提供基本条件。大量事实表明，ECFA不但改善了台湾投资环境，帮助台湾提升经济竞争力，而且让台湾工商界特别是中小企业、基层民众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sup>②</sup>在总降税获益方面，台湾可获得近300多亿元新台币，大陆则获得30多亿元新台币；台湾产值将增加8976亿~9245亿元新台币，成长率在2.75%以上；在就业方面，台湾为此将增加26万余就业人数，成

<sup>①</sup> 萧万长：《一加一大于二：迈向两岸共同市场之路》，台湾：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版。

<sup>②</sup> “经济注活水 百姓广受益——ECFA对台红利大盘点”，新华网，2012-6-14。

长率在 2.5% 左右；台湾 GDP 也将为此增长 1.65% ~ 1.72%。另外，岛内相关产业链上的 10 多万中小企业可以从 ECFA 直接获利，其中以面板、纺织、汽车零组件及农业占大宗。随着大陆对台逐步实施 500 多项产品零关税及数十项服务市场开放，有效增加台湾产品对大陆出口以及台商对大陆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拉动岛内的投资与需求，促进相关产业与总体经济的发展。随着两岸经贸整合程度的加深，两岸实现在价格、投资、运输、保险、税收、银行，以及货币政策等方面的合作和调整，进一步消除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流动的障碍，促进海峡两岸经济要素的充分往来和相互适应，这些合作和调整终将突破低政治层面，进一步上升到政治层面。

通过 ECFA 实现两岸经济一体化，建设形成两岸“市场同盟”的结构，是确保“以经促政”中取得主动权和优势的重要条件之一。在强大的市场力量推动下，两岸经贸关系获得快速发展。2013 年，两岸贸易总额达 1972 亿美元，成为奠定两岸统一市场体系的重要力量。

## （二）连接共同利益关系，壮大主张统一阵营

共同的物质利益是民族凝聚的基本动因之一。经济物质利益推动着为数众多的小国融合以统一民族为基础的大国，这一点无论是在古代中国还是在西方早期历史中都得到充分印证。通常情况下，生产力发展导致各方经济利益相互连接，由此产生了共同利益，这一共同利益在政治上客观要求相互间进一步统一。对新受益的人群来说，其利益与分裂势力的利益是背道而驰的，为了维持和扩大他们的经济利益，在权衡利弊之后，他们有可能“自觉地”成为赞成和支持统一的力量。诚如列宁所说，“当这些群众的切身利益——主要是经济利益，特别是对于他们切近的、敏感的和认识到的经济利益——被触犯时，他们就能够投入运动，至少能够成为少数觉悟的、有坚决的主动精神的人们的支柱……”<sup>①</sup> 从历史上来看，凡是主张国家统一的势力都积极推进分离部分之间的经济发展，如俾斯麦和意大利的进步力量就是如此。与此相反，那些反对统一、坚持分裂的势力则竭力阻碍这种经济关系的发展，例如普鲁士的唯一对手奥地利嫉恨以普鲁士为首的小德意志统一方案，千方百计破坏之；又如“台独”势力在两岸关系上的所作所为就充分说明了这点。ECFA 给台湾业界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不仅大集团受惠，

<sup>①</sup> 《列宁全集》，（第 5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第 594 页。

中小企业也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但一些反对声音却声称“看得到，吃不到”“两岸协议多没发挥功用”，云云，两岸服贸协议甚至在台湾被攻击为“侵略”，背后都有“台独”分子的算计，都是有悖事实的，其目的是要抹黑大陆的善意，污蔑大陆惠台政策。

两岸经贸往来所形成的共同利益已经为对抗分离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支持统一的阶层一旦形成，就会在共同物质利益基础上继续扩大。在中国统一的进程中，香港、澳门、台湾都出现了类似的阶层，由于其经济活动超出了原有地区的范围，卷入了整个国家的市场甚至国际市场，使得有一部分原本对统一漠不关心，有的甚至是坚持分裂的顽固势力，因其切身经济利益、新的经济关系与国家的命运捆绑在一起，最终政治观点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漠不关心或坚持分裂转变为拥护统一的中坚力量。例如，两岸经济关系相互依赖程度的增加，使得岛内产生了一个从经济利益出发反对“台独”的独特群体——台商及其亲属。在“台独”势力在岛内大搞“文化台独”、相当部分民众对台湾定位、祖国统一等重大问题产生认识上的混乱时，原有从文化、历史和血缘角度的反“台独”群体力量相对削弱，而从经济利益角度出发反对“台独”和制约“台独”的角色则日益突出。2000年9月时，一百多位台商协会负责人发表联合声明，希望台湾当局在年底以前开放“三通”，并希望台湾当局能对大陆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的“大陆、台湾同属一个中国”说法有所回应，以营造两岸复谈的气氛，促使两岸早日复谈。<sup>①</sup> 2005年，与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陈水扁有着不凡交情的台湾奇美集团创始人许文龙，在没有事前知会民进党当局的情况下，公开发表“退休感言”，开宗明义定位自己是生意人，同时表示他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赞成三通直航、反对“台独”，最后还强调《反分裂国家法》的制定让他心里踏实许多，称“因为敢到大陆投资，就是我们不搞‘台独’，因为不搞‘台独’，所以奇美在大陆投资一定更加兴旺”。<sup>②</sup> 此言一出，台湾岛内一片哗然。许是“台独”的铁杆支持者、有着深绿背景的企业大亨，其态度180度转变令所有“独派”人士措手不及。众所周知，许文龙一直是民进党的“幕后金主”，他曾公开支持陈水扁搞“台独”，且与李登辉交往甚密。即便

<sup>①</sup> 周德惠：“百余台商联合声明，促年底以前开放三通”，《联合报》，2000年9月14日，3版。

<sup>②</sup> “绿色台商许文龙发表公开信支持反分裂法”，新浪网，<http://news.sina.com.cn/c/2005-03-28/03595479155.shtml>，2005-03-28。

如此，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是一生意人”，许还是为几十万效力奇美的员工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许文龙的例子再一次证明：两岸经济交往不断加深，使两岸人民越来越深地联系在一起，正在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不可分的利益共同体。形势比人强，即使是最顽固的“台独”分子也会在共同的利益面前改变立场。作为一个历练多年的老商人，许文龙的例子与其说他已经看清了“台独”分裂势力的前途，不如说台商或者台湾人民的利益已经使他无法沉默。

2003年12月25日，胡锦涛在与台资企业协会负责人会谈中提出，“面对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理应密切往来、加强交流、扩大合作、共同发展”，并提出“四个有利于”<sup>①</sup>的两岸共同发展主张。经济发展是两岸人民的共同利益所在，也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基础。推动海峡两岸经济交流与经济合作非常重要，尤其对经济处境较为困难的台湾更为重要。胡锦涛从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出发，从海峡两岸的共同利益出发，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30周年座谈会讲话中将“推进经济合作，促进共同发展”作为六项主张的第二条进行了阐述，提出“两岸同胞要开展经济大合作，扩大两岸直接‘三通’，厚植共同利益，形成紧密联系，实现互利双赢”。这一论述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新一代领导倡导海峡两岸要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开展经济大合作、大发展、大融合，让海峡两岸形成更紧密的经济体，实现互利双赢与共同发展。

面向未来，两岸有必要、也有条件走共同发展之路，建立更加现实与重要的经济利益纽带。只有两岸共同利益增加，共同利益厚实，才能形成利益共同体，才会减少两岸间的分歧，降低矛盾与冲突，才能同舟共济，共同发展，可以说“共同利益”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缺少共同利益或者共同利益不足，两岸经济合作的动力就不足，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前景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当两岸紧密的经济联系将双方紧密地“绑”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赖的程度越强，“台独”实现的可能性就越小。当两岸共同经济利益超过两岸单方面特殊利益时，当两岸共同经济利益形成融合的态势时，两岸的政治难题和政治分歧终将破解两岸关系和

---

<sup>①</sup> “四个有利于”即“只要是对台湾同胞来大陆投资经商、兴办实业有利的事情，只要是对两岸经济、科技和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有利的事情，只要是对两岸关系发展和祖国统一有利的事情”。